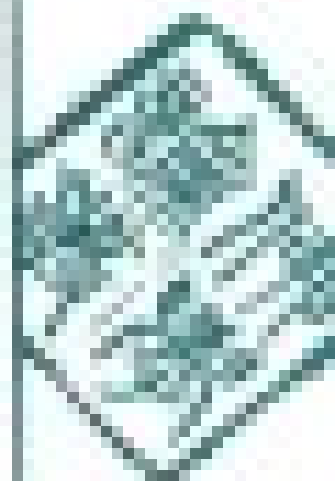




扬州大学佛学论丛 2

周新国 李尚全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福州大学佛学丛刊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大学佛学论丛. 第2辑 / 周新国, 李尚全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26-03696-9

I. 扬… II. ①周… ②李… III. 佛教一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302 号

责任编辑: 李树军

装帧设计: 王林强

扬州大学佛学论丛 2

周新国 李尚全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 插页 2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3696-9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佛教口述史学

我的佛门生涯（1949年前） 周新国 李尚全采访 丁慧超整理（1）

佛教社会学

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建设功能

——佛教信仰及其认同模式 李向平（15）

人间佛教产生的思想契机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 缪方明（44）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特色 欧阳镇（54）

九华山佛教文化简述 李桂红（65）

解脱与涅槃

——原始佛教教理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赵 娟（78）

圣凡之间

——试论“人间佛教”的出世与入世观 花 玲（88）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社会公益活动 王祥伟（97）

慧庆寺史话 孙中旺（112）

佛教史学

- 法进与《东大寺授戒方轨》..... 屈大成 (121)
- 东林志恩大师略考 徐文明 (137)
- 《禅林宝训》论“住持之道” 蒋九愚 (144)
- 晚明高僧紫柏与僧友的交游
- 兼论紫伯与晚明的佛教 高峰 (167)
- 梁武帝与阿育王 李晓虹 (184)

佛教现象学

- 禅宗的法供养观念 李国红 (195)
- 遣除语言的遮蔽
- 文殊与不二法门 肖黎民 (209)
- 论曹溪禅之顿悟义 王党辉 (222)
- 浅论佛教的“无情有性”思想 张爱林 (232)
- 净土宗解脱论 曹晓虎 (245)

我的佛门生涯（1949年前）

——贯澈和尚的口述

周新国 李尚全采访 丁慧超 整理

少年出家

我本姓王，生于1929年2月1日，农历戊辰年腊月二日，属龙，家中兄弟姊妹7人；老家在江苏大丰大桥镇三圩村。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记忆中小时候家里很穷，不仅因为家里弟兄姊妹多，那时候左右邻居包括村里村外都很穷。我的家乡大丰是在我出生以后的1942年初设县的，当时因地处东台县北部，定名台北，1951年又更名为大丰县。我的祖上是以煮盐为业的，民国年间盐田才开垦种棉成为盐垦区，但盐碱地的土壤条件和沿海自然灾害还是影响和侵害着庄稼的收成，当地农民有“十年九不收”之谚。

大丰县西部地区成陆较早，北宋时有紫庄、丁溪、竹溪等盐场。元代设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五场，隶属扬州路泰州海陵县，明代五场均在扬州府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境内。



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接受贯澈和尚所赠《大藏经》

清代，各场盐政隶属两淮盐运司泰州分司（刘庄、白驹二场在清乾隆以前属淮安分司），行政则属扬州府东台县、兴化县。清末诸场先后裁并，统一于草堰场，其行政区划：斗龙港以东属东台县，斗龙港以西以北则属兴化县、盐城县。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南通张謇在此创办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以后泰和、通遂、遂记、通济、裕华等公司相继建立，丁溪、小海、草堰所辖境域行政属于东台县，刘庄、白驹所辖老圩东部行政属于兴化县。1940年10月，新四军挺进江淮平原，在大丰境内先后建立小海区、垦区、西渣区，属东台民主政府领导。1941年9月设台北行署。1942年改设台北县，隶属华中局苏中第二分区。1944年撤台北县并入东台县，隶属于第四分区。1945年11月第二次建立台北县，隶属于苏皖边区政府第一专区。1949年5月划属苏北泰州地区专员公署。1950年1月改隶于盐城地区专员公署。1951年8月县名改为大丰。1983年3月盐城建市，大丰县在其辖境。

所以我从小就营养不良，身体瘦小，又常生病。十岁那年，父亲领着我上私塾，先生一看却坚决不收，说是七岁的孩子太

小，没法教。无论父亲怎么恳求，先生一再摇头，不肯收留。我十一岁时，才被允许在一家私塾里读书。当时的两个教书先生，一个叫杨洪官，另一个叫朱俊臣，他们给我起个学名王殿才，寓意将来乃为一殿试之才。我身体瘦弱干活不行，但我喜欢读书。在私塾的第一年是识字，并开始学写毛笔字。先生规定每天习字必须写满百字以上。当我第一次抓起毛笔开始，我就与生俱来地喜欢上了它，当然尤其是写小楷字我是更加一丝不苟的。在私塾的第三年，我已经读了《大学》、《中庸》、《孟子》、《礼记》等书。但我还是因为体弱多病而不得不中途辍学。

父母担心我长不大，请了一位相面先生来家里相面。相面先生告诉我父母说，你们这个孩子在家里是养不大的，如果要想孩子活下去，除非送到庙里；当然相面先生还说我有常人难得的三重华盖星，是命中注定必须出家。

在我的家乡，当时信佛是普遍的，出家当和尚也更是大多先辈走过的老路。相面先生的一席话道明了我有出家的因缘。我的父母对相面先生的指点当然是信以为真的。

在我的家乡要找一个庙出家是很容易的事。父亲就领我到了附近沈灶镇的太平庵。掌庙的老和尚叫普润，人很和蔼，看我身体虽然瘦弱但还机灵，表示愿意收留我，只是跟父亲强调，庙里是很苦的，要能吃苦耐劳才可以。父亲赶紧说：孩子能吃苦，只要能长大，再苦也不怕。

于是，在我十四岁那年，即1943年的2月，我在沈灶镇的太平庵出了家，普润和尚也就成了我的师父，他给我取法名香筏，字贯澈，别号再生。

庵，亦称尼庵。原指隐世修行者所住的茅屋。一般为比丘尼所居的寺庙，但也有比丘所居的寺，也叫庵。

扬州大学佛学论丛·佛教口述史学

乱世苦修

我出家的太平庵在当地不算大庙，是一座私庙，有10名和尚，有大殿3进和禅房20多间，庙里收入除了香火外主要就是做佛事。

我刚进庙，每天除了干些砍柴挑水等粗活外，主要时间就是背诵五堂功课。我在庙里的身份是沙弥。

但因为我能写一手好字，所以主要负责庙里所有的文字工作，诸如各种佛事的疏文、牌位、榜文等等，我也很快受到老师公（即普润和尚的师父）的青睐。老师公在圆寂前，曾嘱咐普润：这个小孩是有出息的，将来要送他到江南去受戒，而我的师父普润就是曾经在南京宝华山受的戒。

受戒必须年满二十方可。但师父在两年后（即1945年）就把我介绍到其弟子巨善所住持的吴县东渚镇卫王庙，学习各种佛学礼仪和功课，为受戒做准备。我知道这全是师公、师父对我厚爱和一片苦心，所以虽然在卫王庙我每天要干粗重杂活，我的背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微微有点驼，但我每天学习异常刻苦；我也牢牢记着当时父亲对普润师父的许诺：我是能吃苦的！三年后（即1947年冬）在师父巨善的推荐下，我来到上海龙华寺受戒。受戒是要缴戒费的，当时龙华寺的戒费为法币1000元。

龙华寺，在上海龙华镇。五代吴越时建，初名龙华教寺，北宋治平元年重修，改空相寺，明永乐年间复名龙华寺。清代咸丰年间，观竺法师住持龙华寺。他是天台宗第四十祖，在龙华寺弘扬天台宗。1911年，近代高僧谛闲法师主持龙华寺，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三世传人。1936年《上海研究资料》记载，龙华寺尚存有大雄宝殿、大悲阁、方丈室、金刚殿、三圣殿、弥勒殿、伽蓝殿、观音殿、祖师殿、地藏殿、罗汉堂、钟楼、鼓

楼、客堂、斋房等建筑。可惜1937年大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战火之中。到上海解放时，已破坏不堪，有毁灭之势。民国期间，性空法师在该寺曾举行过三次传戒法会，影响较大。

这次受戒法会，礼请南京宝华山的性空法师为传戒和尚，广袖法师为羯磨阿阇黎，大悲法师为教授阿阇黎，他们都是有修有证的大善知识。当时与我一起受戒的有1300多名戒子，规模宏大。受戒时，要长跪半天，绝大多数戒子都吃不消，而我这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却以瘦小的身子坚持不倒，当时即受到众人的广泛称赞。

受完戒，我就正式成为一位比丘了。这年我虚岁二十，实际年龄只有十八。1948年春，我来到苏州灵岩山寺，这里是我敬慕的印光法师所开辟的净宗道场，并举办灵岩山寺净宗佛学院。

苏州灵岩山，在春秋时代曾是吴王夫差的馆娃宫。东晋元帝的司空陆玩舍宅为寺，梁武帝天监年间增拓为秀峰寺，天监二年（503）建成供奉佛舍利的灵岩塔，即今多宝塔。南宋绍兴年间，太傅、韩蕲王（韩世忠）于寺荐先福，名显亲崇报寺。明洪武改为十方丛林。明清时二度毁于火。清宣统三年（1911），普陀山三圣堂真达上人被请主持本山，开始了兴复。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开为十方净土道场。院事由妙真上人负责。二十六年（1937）冬，印光大师移锡灵岩。二十九年（1940）圆寂于此，奠定了净土道场的特殊地位。1948年开办净宗佛学院，讲授《弥陀要解》、《四教仪集注》等天台、净土课程，一直坚持“教遵天台，行归净土”的传统。

1948年的苏南是国统区，战火的迫近和饥饿的煎熬也使灵岩山变得一片萧条。寺院内的条件是异常艰苦的。刚到寺里的僧人和寺里的僧人一样都必须参加劳动，每天从早晨三点半一睁开眼就出坡，出坡回来还要做五堂功课，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能躺到床上休息。每天吃的是黄米、冬瓜、咸菜、酱菜，几

乎不见油星，早上另加豆腐渣。但是，尽管条件这么艰苦，聚集的僧人却是很多，人们的心是平静的，大家都虔诚念佛，祈求天下太平。

吃苦对我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在这清苦而井然有序的环境里，我一心念佛消业。每天早晨喝上三、四大碗的豆腐渣，品味着这股浓浓的豆香，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我体味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渴望，一种对佛的无限的亲近！有一次在上山时，我因太劳累，不幸下坠，几天后腿上伤口处长有铜钱大的毒疮，疼痛难忍。寺内寮元法师知道后，安排我到厨房干活，不用再爬山拾柴了。客堂为我进了单，并允许入净宗佛学院学习。

印光法师一生阐扬净土宗，提倡专一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注重实践，身体力行，弘一大师曾赞扬说：“僧伽如印光大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经印光法师三年左右时间的弘扬和倡导，此时的灵岩山已成了大江以南最著名的净土道场。

印光法师，俗姓赵，名绍伊，出家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自小从长兄读儒书，“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说。”后来病目，几至失明；到目疾渐痊，批阅释典，研究有悟，乃发心出家。光绪七年（21岁），在西安终南山南五台的莲花洞寺出家，道纯和尚为他剃度。

光绪八年，到陕西兴安县的双溪寺，从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之后就到终南山太乙峰结茅潜修五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到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挂单念佛专修净土宗。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职，翌年又住北京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年），随普陀山化闻老和尚到法雨寺，安单在藏经楼。在法雨寺励志精修，唯念弥陀。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后开讲《弥陀便蒙钞》，听众钦佩。讲经毕，在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年，学行倍进。出关后，法雨寺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两年后，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光绪

三十年（1905年），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请他协助去北京，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宣统元年，结识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的太虚，此后数度交往，一老一少建立了较深的感情。十余年后，太虚推动“整顿僧伽制度”，但印老不以为然。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印光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光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印光到普陀山二十五年，直到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才出山活动。先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后到上海小住。第二年为印经事，又到上海，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供千元印经之需。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又迁到苏州报国寺闭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印光出关到上海参加法会。上海八一三松沪会战开始后，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得已，应妙真、了然、德森等人的请求，迁到城外木渎灵岩山去住。在苏州，印光还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以后，受在家弟子皈依，20年间，皈依弟子10余万人。他的著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他的弟子辈及上海缙素，在上海净业社的觉园，成立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刊印他的遗著，发行《弘化月刊》，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并且尊他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

净宗佛学院是白天上课，晚上讲开示。所开课程，除了净土宗的经典外，还开设了天台的《教观纲要》、密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律宗、唯识等其它宗派的课程，也教授天台止

观、四分律藏等经论。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才真正使我明白：出家并不是仅仅做佛事，而是应该理解佛陀的教理，得到佛法的教益。人生真正难得，佛法真正难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怀着难以言表的激动和憧憬，学习更加刻苦。常常白天听不懂的，到晚上竟然在睡梦中懂了。比如说，“心是性之用，性是心之体”。白天法师讲得很细致透彻，但就是怎么也弄不明白，整天地想个不停。到晚上睡觉迷迷糊糊梦中似乎另有个声音在给自己讲解，而这时居然一听就懂！第二天起床，不由得感叹佛法真正之不可思议！

1949年的春天是令人难忘的。新中国的曙光已在悄然驱散江南国统区的残云。在一片慌乱声中，佛教界在上海常德路418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内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七七四十九天“和平息灾法会”，法会聚集了当时在沪的诸多高僧大德，其中有：秉持“禅净双修”的虚云老和尚、主持法藏讲寺的兴慈法师、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院长圆瑛法师、一生主要以弘法是务的静权法师以及密宗能海上师最得意的法子清定上人。当时净宗佛学院选派了48人参加净土坛，我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短短的近两个月内，能够听闻这么多大善知识的淳淳教诲和佛法的修学体悟，实在是非常殊胜的因缘！

虚云（1840—1959）法名古严，又名演彻，字德清。湖南湘乡人，俗姓萧，出身官宦人家，十九岁逃离家庭，披剃于鼓山涌泉寺，行脚天涯，巡礼名山，遍学经教，参究禅宗。四十三岁发愿朝礼五台山，数年间，进川入藏。越雪山至缅甸、印度、锡兰朝礼佛迹，历尽艰辛。曾结茅潜修于终南山等处。以定力、苦行、坚忍著称。一身兼祧禅宗五家法脉，中兴云门宗，延续沩仰、法眼二宗。曾创立鼓山佛学院培养僧徒，重振禅宗祖风，制定丛林清规，率众参加劳动，农禅并举。德高望重，归依弟

子达百万众。1953年被推为中国佛协名誉会长。虚云和尚的佛学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调佛教的导引人心，趋于至善，移风易俗，辅政安民，恪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祖训。二是特重戒学，一生实践，戒行精严，定慧圆明。三是主张四众弟子应当以“信”为基础，恒持修行。四是提倡《楞严》思想。五是主张禅净不二，秉持“禅净双修”的理念。六是对参禅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认识。著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圆觉经玄义》等，后人辑其语录偈颂为《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等行世。门人有佛源、一诚、定慧、本焕、传印、净慧等。

——以上参照百度网“虚云百科”条目

兴慈法师俗姓陈，法名悟云，别号观月，浙江新昌县人，清德宗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十四岁以父为师，依父剃度出家，后依国清寺的从镜和尚受具足戒，继承从镜和尚的法脉。他由出家起，就先后在中方广寺、太平庵、苏州隆庆寺等处听经。先后听过《楞严经》、《法华经》、《弥陀疏钞》等，立志研究经教。二十七岁起就登座讲经。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天台山的中方广寺发生火灾，寺院殿宇付之一炬。他历时十年，卒将中方广寺恢复旧观。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曾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之请，在上海爱俪园讲授《天台四教仪集注》。上海沈映泉居士捐资建立超尘精舍，请兴慈法师以精舍作为培育僧才之所。兴慈乃以超尘精舍作为弘法之用，登座讲经，四方学僧闻风而来听讲者户限为穿。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起，开始兴建法藏讲寺，法藏讲寺成为上海一所颇具规模的净土大刹。后来在法藏讲寺内设立学社，以天台教观为指南，以净土法门为依归，教诲四众。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回天台山出任华顶寺住持。中日战争期

间，他在江南弘化四方，在上海、杭州、南京、绍兴、苏州、常熟、无锡、南昌等地诸大名刹，讲过《楞严经》、《法华经》、《地藏经》、《阿弥陀经》，为各地信众所称颂。这时，江南一带相继为日军所占领，各地难民涌入上海，衣食两缺，兴慈本着佛家慈悲精神，与上海佛教界人士组织“上海佛教同仁会”，救济难民。他被推为会长。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光复，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锣鼓声中庆祝胜利》一文发表，对日寇、汉奸加以无情的指责，对抗战胜利、和平来临又无限地欢欣鼓舞。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兴慈在法藏讲寺创办“慈光补习学校”，招收社会上失学的清寒子弟，施以初中教育。翌年，又创办“兴慈中学”，兴建校舍，组织董事会，聘请沪上名流章士钊、屈映光、范梅僧等为校董，招收初中毕业青年，施以高中教育，为社会培育人才。同时又在法藏讲寺内开办“慈光施诊所”，聘请中西医四名驻诊，施医舍药，免费为贫病市民服务。1950年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逝，世寿七十，僧腊五十有六。兴慈的佛学思想，是教弘天台，行传净土，禅净双修，学通教观，行解并进。他著作不多。中华民国初年，编著《二课合解》一书，流通甚广，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又加以重订。该书内容涉及显密、禅净、大小乘各种经典奥义，以及天文、地理知识。其中对于佛经中所提出宇宙观的理论，如须弥山、四大部洲、三界诸天、三千大千世界等，均依据经文加以注解，为初机学佛人士解释疑团。除此以外，尚著有《金刚经易知疏》、《蒙山施食仪轨》、《开示录》等行世。

——以上参照百度网“兴慈百科”条目

圆瑛，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六岁时父母双亡。十八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翌年，到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

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宣统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中华民国三年，他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他禅、净兼修，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中华民国十七年，他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是年秋，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团长。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他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檳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秋，圆瑛在上海与明暘被日本宪兵逮捕。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严词痛斥，并绝食以示抗议。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等大量论著。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

信论》、《金刚般若》、《法华》、《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是年9月12日在天童寺圆寂。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且擅长诗文、书法，国内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遗墨。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

——以上参照百度网“圆瑛百科”条目

静权法师，讳宽显，号实庵，浙江仙居县工峻黄皮陈坑人，俗姓王，名寿安。自幼习儒，学习经书子史，有卓越远见。1905年24岁丧父，悲恸厌世，投天台国清寺，从授能和尚座下，剃发为僧，受比丘戒。则借月光读经，有愿博究三藏，向往宁波观宗寺，亲近谛闲老法师，受学天台教观，造诣深入。1931年首讲《法华经》，遂立天台山佛学研究社，四方学者，闻道聚集，络绎不绝。同年十月，宁波姚北金仙寺亦幻法师敦请静权法师莅寺演讲《地藏经》，当时弘一法师适驻锡该寺，曾参席听经，闻其阐扬教理之际，弘师感动，潸然泪下。故众赞“活地藏”之美称。佛学研究社学僧，在静权法师坚持不懈讲授下，天台教理水平普遍提高，教务活动，蓬勃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起，静权法师有感于日寇侵略，生灵涂炭，曾至宁波、临海等地宣讲大乘教典《法华经》、《仁王护国般若经》诸经，倡导抑恶扬善，宣扬爱国主义思想。1945年至1948年邀请到杭州大通寺讲《无量寿经》、灵隐寺讲《地藏经》、法云庵讲《金刚经》等。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杭州法云庵又请讲《药师经》